

胜利周年纪念

周年四胜利战争抗日纪念

金寨文史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金寨县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

JINZHAI
WENSHI

前 言

一九八五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四十年前的往事，给我们留下了极为痛苦的回忆。

追溯历史，远在秦汉时期，中日两国就有了交往，到了隋唐时期，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更为频繁。以后，既有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又有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祸及中国人民的战争。尤其是近百年来，由于清帝国的昏庸、腐败、无能，引起各帝国主义意欲瓜分中国的野心。仅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而言：一八九五年侵占我国台湾；一九三一年强占我国东北三省；一九三七年进一步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铁蹄所至，火光血影，蹂躏了中国的大好半壁河山。一九三八年、一九四三年日本侵略军曾两次入寇大别山区和金寨县境，轰炸流波砦，祸害开顺街，火烧金家寨，血洗茅坪……等等滔天罪行给我们留下了血腥的惨痛的记忆。日本侵华战争，不仅仅为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留下了可悲的创伤。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最大限度地动员了人民群众，奋起抗战，共御外侮，发展了抗日战争的大好形势。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各抗日爱国军事力量，前赴后继，流血牺牲，运用国际、国内的有利因素，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金寨文史》第二辑选印了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大别山

区，发生在金州地方，经过核查过的部分有关史料。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忠实地记录下这一段史实，为的是让人们记取两国人民都饱尝了的惨痛的教训，反对霸权，珍惜和平，友好交往，互利前进。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今后，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将更为密切。我们希望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

编 者

一九八五年八月

《金寨文史》第二辑

目 录

前 言 编 者

回忆抗日战争初期安徽省工委鄂豫皖区党委的

一些情况 张劲夫 (1)

抗日战争初期在皖西 侯奕斋 (5)

我和新桂系的关系 郭 坚 (13)

广西学生军在大别山上

——访原广西学生军王彦同志 佚名 方六 (40)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麻埠抗日救亡运动片断 余允龙 (52)

新桂系治皖述略 陈子生 (60)

新桂系统治下的立煌 张善群 (69)

新桂系时期的安徽教育 王立仁 (98)

流波碛第一次被炸纪实 余维纪 (104)

多难的流波镇 吕绍钧 (107)

日寇祸害开顺街 台大庆 (112)

我被派往松子关阻击日寇 江亚东 (118)

日寇陷金寨 吕绍钧 江放蕻 (122)

趁机入侵——日寇窜犯大别山回忆片断 何仲容 (139)

抗日时期的安徽省会——金寨镇 辉 池 (143)

二十五里长街被焚烧数百名群众遭杀戮

——记一九四三年元月日寇在金家寨一带的罪行

.....	吴思俊 (148)
血洗茅坪——记日寇一次大屠杀 ...	李道儒 卢原炯 (151)
日寇狂炸杨家滩	韦德荣 韦德明 (153)
立煌沦陷历难记	子 怀 (157)
中国人民永久不忘日本帝国主义的血债	郑长平 (160)
历史的悲剧不许重演	
——一个幸存者的自述	黄宜耕 (163)
日寇罪恶补零	慈 游 (166)
康王寨上歼击日寇	周祥璧 (168)
抗日战争时期的麻埠	徐经华 (171)
吴家店飞机场	周瑞亭 (175)
李品仙送匾联宗	舟皿 建章 荣光 (179)
干训生与贞干中学	陈宗尧 (184)
金寨县最早的一条公路	江伟航 (187)
抗日战争时期的立煌县农场	吕自煌 (189)
小资料 九一八事变(39) 一二八事变(59) 卢沟桥事变	
(167) 抗日民主政权(183) 三光政策(106) 南	
京大屠杀(165) 台儿庄会战(162) 百团大战(188)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97) 抗日战争时期立	
煌行政区划, 大、中、小学分布情况(191)	
编 后	编 者 (194)
封 面 一九四五年八月,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 安徽省会	
立煌(金寨)各界人民欢庆胜利	
封 底 一九四三年元月二日, 日寇血洗茅坪死难群众公墓	

回忆抗日战争初期安徽省 工委、鄂豫皖区党委的一些情况

张 劲 夫

一九三八年一月（春节刚过），我由武汉长江局委派，经信阳到安徽，利用社会关系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因我在上海地下党工作时，认识一些人，去时，刘顺元同志告诉我：安徽地下党组织已被破坏，要我发展组织，打开局面。三月和四月初，又相继派彭康和谭光廷二同志来六安找到我。在六安小东门六德公园旁租了房子，作为机关。彭、谭传达长江局决定，成立中共安徽省工委，彭康任书记，李世农任组织部长（时在舒城），张劲夫任宣传部长，谭光廷任军事部长。成立省工委的时间是四月初（阳历）。这时，彭康同志带来的关系有曹云露同志，新四军四支队民运队及兵站的同志，还有在舒城一带活动的地下党同志组织关系。安徽工委下属：六安中心县委，书记黄岩；寿县中心县委，书记曹云露；舒无特委，李世农兼任书记，黄育贤（桂莲）任组织部长；太湖中心县委，书记孙毅。五月，安徽省工委搬到立煌（金寨）桃树岭（兵站所在地）。六月，日寇向六安进攻，到了苏家埠、独山（日寇未到麻埠）。这时，安徽工委机关由桃树岭搬到白水河，中央给我们送来两部电台。七月，刘

顺元、喻屏同志也派来安徽参加省工委，同时参加省工委的同志还有黄岩、郑维孝等同志。这时，刘顺元同志自告奋勇，到舒无特委帮助工作，发展组织，发展革命武装。抗日初期形势很好，各县动委会的指导员很多是我们地下党的县委书记，一些县长也听我们的话，如无为县长胡竺冰，庐江县长翟宗文（参加过大革命，在国民党内有资望）等。为了开展革命工作，八月间舒无特委分成两个特委：一个特委管庐江、无为等县，调黄岩同志去负责；一个特委管舒城、桐城等县，由桂蓬同志负责。黄岩同志走后，工作由吴皓同志接任，六安中心县委管六安、霍邱等县。十月，武汉失守前，何伟同志以新华社记者身份来皖，参加工委，并传达长江局指示，拟成立鄂豫皖区党委，辖鄂东北、豫东南、皖西等地区工作。年底，郭老（郭述申）来白水河。这时工委已撤销，成立区党委，书记郑位三，组织部长何伟，宣传部长彭康，民运部长张劲夫，军事部长谭希林，五人组成常委。委员黄岩、程坦、周孝乐（即周新吾、豫南人）等。成立区党委后，另由刘顺元、方毅、李世农、谭光廷、喻屏等同志去皖东即淮南路以东开展工作（是郭老来传达的），成立皖东省委。区党委民运部下面成立了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陈少景，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孙以瑾。宣传部下面成立文委书记朱凡（现湖南大学校长）。广西军内的工作和桂系省政府内地下党的工作，和我直接发生关系。我们向各县派了一些党内同志去任县政府的秘书、科长、县动委会指导员。如立煌县政府秘书刘宏（现在广西），立煌县动委会指导员王伯苑（现在江苏），六安县动委会指导员田兰田，霍邱李华封、刘鸿文等。一九四〇年我们撤退时，广西学生军都撤到解放区去了。

一九三九年七月，中央指示：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向我们发动进攻，要鄂豫皖工作重点转移敌后，区党委机关也转移。七月二十四日，我和郑位三即到东汤池，彭康、谭希林是随后去的。何伟同志留下，以新四军办事处主任身份出现。会议后，决定鄂东、豫南工作交与李先念同志领导，在立煌一带的已公开身份的同志撤退，由何伟同志去部署，并派李丰平同志去金家寨，以立煌市委的名义秘密领导地下工作。丰平同志主持立煌市委工作是一九三九年十月至一九四〇年三月，后来是和我们的电台一道撤走的。各地的工作团和地下工作同志总数三千人左右，陆续撤到解放区，仅桐城就有好几百人，大多是知识分子干部，如方琦德同志等。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新四军四支队主力到定远一带，中央通知我们和主力部队靠拢，准备大发展。到藕塘瓦屋薛，同刘顺元等同志又会合了。会合后，又听刘少奇同志（当时改名胡服）传达毛主席指示，要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武装，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一九四〇年一月，成立路西省委（彭康等同志负责，彭任书记），路东省委（张劲夫、李世农同志等负责，张任书记）。一九四〇年二月（二·七政工会议前），我调到新四军五支队政治部担任主任，由方毅同志任路东省委书记。到了三月，国民党顽固派桂系部队和韩德勤部，向路西、路东我军驻地进攻，我军进行了有名的半塔保卫战，取得了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建立了路西、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领导指挥这次自卫反击战的有刘少奇、张云逸、邓子恢、郑位三、徐海东等同志。一九四〇年六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由路西转移到路东。一九四〇年七月我跟罗炳辉同志等去开辟淮宝根据地，和八路军南下部队黄克诚同志在这

里会师。

关于安徽省动员委员会问题：李宗仁假装进步，对安徽进步力量，加以利用，如朱蕴山、常藩侯、沈子修、光明甫、周新民、童汉章及外来的章乃器等，都委以较高的职位。省动员委员会的组织部长是沈子修，宣传部长是光明甫，后勤部长是常藩侯，总务部长是朱蕴山，情报部长是丘国珍（开始丘的工作是对日本，后来对我们了）。省动员委员会主任李宗仁，由秘书长章乃器代行，后又由朱蕴山以秘书身份代行后代理主任委员职务。动委会下面成立青年抗敌协会、妇女抗敌协会、少年抗敌协会、农民抗敌协会、工人抗敌协会，还成立了四十多个工作团及十多个委托工作团。

关于党的组织，立煌县委书记徐其昌、周维（区党委组织科长，驻立煌工作）等；霍邱县委书记黄岩（兼）、吴皓、李华封等；六安县委书记田兰田、李金平等；舒城县委书记鲍有逊（刘顺元同志爱人）；霍山县委书记侯文翰等；寿县县委书记曹云露（兼）、李德观（女）等。

（注：此材料是六安地区编史办姚维山、金寨县编史办顾旭一九七九年五月七日于北京医院访问张劲夫同志记录，由顾旭整理，并经本人审阅过）。

（转载自《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1984年4月第二期）

抗日战争初期在皖西

侯 奕 斋

抗战开始后，活动在鄂豫皖边区的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奉命开赴皖东抗日前线。随着日寇的节节逼进，京津沪宁等城和京浦线、陇海沿线地区相继沦陷，以皖西金寨县（时称立煌）为中心的大别山区战略地位更显得重要了。相继设在这里的中共安徽省工委和鄂豫皖党委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利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和蒋桂之间矛盾，团结各方面的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民主运动。当时，我带着抗日救亡的使命来到皖西，活动在广大青年和国民党安徽省的中上层人士中，历时近两年。四十多年的往事，记忆犹新。

在 工 作 团

一九三七年秋日寇占领北平，我结束在北平的学运工作回到南京，经芜湖来到安庆，很快和这里仅有的两名党员方琦德、刘丹同志接上了头。我们三个党员团结了来自北京、上海、南京和安徽各地的大中学生，以各种形式在安庆街头和郊区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南京沦陷前夕，我们趁着当时国民党成立“安徽省抗敌后援会”的机会，串连一些上层人士，组织“抗敌后援会各县流动工作队”，吸收了坚持抗日、倾向进步

的四十多名知识青年，名为“各县流动队”，实则准备到皖西一带，发动老区人民抗日，开展党的工作。我们带着印刷机、收音机，打着团结抗日救亡的旗号，经桐城、舒城到达霍山。

初到皖西，人地生疏，给养不足，工作开展和对外联系诸多困难。听说国民党安徽省政府迁到六安，並进行了内部改组，章乃器任财政厅长。章一九三六年组织救国会时我在全国学联工作，相互认识。我和方琦德同志一道到六安找章，希望能得到点资助。章乃器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另有一位青年在座。我们辞别章乃器出门时，当时谈话在场一言未发的那位青年赶来向我们打招呼说“侯文瀚（我原来的用名）同志，那位是方琦德同志吧？……”这时。我才注意打量了一下面前这位陌生人，好生奇怪地问：“你是谁？”“我是张劲夫，代表长江局来安徽发展组织、开展工作的。你们‘流动队’的组织关系，已在汉口接上了，都在我这里。以后你们的工作和我联系。章乃器要你们到六安来也是可以的，以便集中力量，打开局面。”我是这时和张劲夫同志认识的。

是时，抗战军兴，人心浮动。国民党桂系为标榜抗日，笼络人心，便在六安正式成立了“第五战区安徽省抗日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我们党通过上层活动，利用这一公开合法机构，在省动委会下，设立四十多个工作团，将几百名抗日爱国青年安排在其中工作，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工作团的同志遍布抗日前线和敌后广大地区，联系了成千上万的地方青年，发展了党的组织，做出了出色的动员群众和宣传抗日工作。按照桂系的一套规定，工作团只能协助保甲体系被动地做宣传鼓动工作。但当时的形势是：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战

地县、区国民党官员纷纷“逃之夭夭”，基层保甲体系大都土崩瓦解了。在前线和敌后都出现了许多反动统治崩溃、日寇时来时去的“中间地带”。工作团同志“当仁不让”地担负起这些地带的基层行政工作。来来往往抗日军队要粮要草找不到保甲人员，就找工作团。工作团很好地完成了这些任务。

我们四十多人编为省直属第十九、第二十工作团，团长都由我担任。两团常在一起活动，原是分配在潜山县工作，不久，因日寇进攻，转移到水吼岭。这时，中共安徽省工委已经成立。张劲夫任省工委宣传部部长，公开身份是省动委会总干事。他来到水吼岭，帮助我们分析当时的形势：安徽大部份已经沦陷或遭日寇侵扰，大别山区也只有金寨、霍山、岳西三县日寇未到。由于这三个县战略地位重要，国民党桂系一定要保，我党也要争取，于是调我们两个工作团到霍山县工作，并决定我任中共霍山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公开身份是县动委会指导员和工作团团长。我便带着工作团再次来到霍山。

舌 战 廖 磊

一九三八年六月，合肥形势紧张，为避日寇兵锋，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由六安迁到金家寨。桂系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和各种政治集团也都纷纷云集金寨。

一九三八年秋，安徽省政府和省动委会在金家寨召开各直属工作团长和各县动委会指导员会议。国民党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政府主席、省动委会主任委员廖磊到会致词。他致词以后，要在与会人员中推人致答词。我经大家推

举上台应付了一下。国民党特务就向廖磊密报：“共产党都集中在动委会里。这些开会的有些是共产党，刚才在会上致词的侯文瀚就是共产党。”要廖磊乘这机会把我们分散，还开了一批名单给他。当时的斗争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由于我地下党员陈慕高、廖玉才同志早已打入省政府当秘书，组织上很快得悉这一情报。直接领导我的张劲夫同志及时找我谈话：“廖磊可能来找你，须加注意。若调动你的工作，不要还价，以防暴露。他要分散我们的力量，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把力量撒开一点，来扩大我们的队伍。”张劲夫同志的年龄仅比我大一岁，遇事沉着冷静，多谋善断，每一问题的处理都使我深受启发。我按照张劲夫同志的指示准备着对付廖磊。果然，第二天民政厅长陈良佐通知我说：“廖主席找你谈话。”

我来到民政厅，不一会廖磊来了，他一见面劈头就问：“侯文瀚你是共产党！？”

“报告总司令，我不是共产党。”

“你前天在会上讲话很厉害呀！讲的有条有理嘛！怎么不是共产党？”

“总司令这话从何讲起哩，难道说讲话有条有理也可以跟共产党划等号吗？”

“你不是共产党为什么当工作团长、当指导员？”

“为了跟总司令一道抗日。总司令千里迢迢来到安徽，我是安徽人，年轻，又是大学生，更应当抗日！”

“你真不是共产党？”

“不是”。

“你不是共产党我就派你一个差事。”

“坚决服从分配！”

“现在大别山的一些县城都失守了，比较大的城镇是立煌县的麻埠镇。这个地区很重要。我派你去当区长，立即要去，快去！”他说着转脸告诉陈良佐：“快打电话给苏云辉（苏原是廖的卫队营长，时任立煌县长），就说我给他派了个区长到麻埠。”接着又回过头来对我说：

“你快点去，区长当得好，当县长，县长当得好当专员嘛，嗯！”

“是！谢总司令栽培！”我学着国民党官场的腔调。

告别了廖磊，我立即向张劲夫同志作了回报。党组织对我的工作作了新的安排。当时正赶上国民党安徽省保安司令部学兵队学员毕业分配，张劲夫同志从中交给我二十人枪，并告诉我说，这些青年可以教育，要我把他们保存下来。我带着这批武装来到霍山，将武装、工作团和党的工作分别作了移交。接着，我带着一名工作团员和张劲夫同志介绍给我的一位懂得旧公事的秘书往麻埠赴任。

在 麻 埠

麻埠，是皖西西南重镇，人口集中，交通方便，市场繁荣，历来是金寨县的经济文化中心。由于国民党的反动腐朽，加之当时桂系一三八师师部住在这里（后驻流波），军纪败坏，常来此处骚扰，把这个城镇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在军队的带头影响下，赌博、吸毒、宿娼、贪污、贿赂成风，社会风气极坏，秩序十分混乱。地方土豪劣绅仗着国民党军队的支持，逞凶霸道，联保主任也有权杀人。人民群众常为兵匪流氓所害，到区署鸣冤告状。作为区长，我目睹这

罪恶的社会现实，心里十分憎恨，时而迸发出青年人特有的火气，总想找个机会，狠狠地打击一下这帮子坏蛋。同时，我也意识到斗争的复杂和任务的艰巨。按照组织上的安排，我在麻埠只单线同张劲夫同志保持联系，不和当地党组织发生关系，因此人们也就无从发现我的可疑行迹。麻埠商会会长、地方绅士以及一三八师的头目，见我来头不小，纷纷和我交朋友，请吃请喝，为我捧场。当他们看到新区长是个二十来岁毛头小子，又都觉得蹊跷。我却盘算着怎样利用这块招牌来为党为人民做些事情。平时，我从除了应付日常公事，就是接待安排过往的抗日部队和青年，遇新四军来就多准备些粮食，并优待照顾。继安徽省工委之后的鄂豫皖区党委机关和新四军兵站都在百里之外的白水河大山里面，不属麻埠区范围，我就经常搞些粮食和其他物资，设法派可靠的人偷偷地送到白水河。同时，深入调查各个联保（当时没有乡）枪支，掌握地方武装情况，并准备在麻埠镇实行禁赌禁娼大刀阔斧地整顿社会秩序，打击一些作恶多端的地方土顽和各种坏分子。整顿和改造麻埠镇的计划，基本上有了打算，只是苦于无法对付国民党军队。实际上这是一种幻想。

一九三九年春节快到了。一三八师将麻埠古建筑拆下来搭台，准备演戏。我想借此机会来整他们一下，就打电话到省政府说：“有要事报告廖主席！”廖磊亲自接电话。我特意对事态加以渲染，提高语气说“……麻埠镇有人拆古建筑搭戏台，准备唱大戏。现在抗战期间，一切从简，能否唱大戏？请总司令赐教！”廖磊回话说：“那不行，抗战期间哪能唱大戏呢？”我接着这一“圣旨”立即颁发了多张大幅布告：

“奉廖总司令电谕：抗战期间，一切从简，禁止铺张演戏……

区长侯文翰”，并盖上区署的大方印，布置区署人员和警察到处张贴。又抓了一批赌头、赌棍、流氓、老鸨、游街示众，高呼口号：“军民一致抗日！”、“伸张军纪国法！打击歪风邪气！……。”一连数日，震动很大。吓得国民党军队也不敢搭台演戏和明目张胆地做坏事了，嚣张气焰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把国民党军队的威风打下去了。顿时，正气上升，邪气下降，人心大快。

去 皖 东

一九三九年春，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统治安徽的桂系势力，开始向右转。各派系的斗争更为复杂，这种斗争反映在国民党上层就是国民党桂系和CC派向我们党的联合进攻。设在金家寨的新四军办事处及其四支队兵站等我党我军的代表机构，受到了监视，动委会的工作受到阻碍，工作团和进步力量的活动受到了限制。动委会和工作团是我党的力量所在。反动派诬蔑工作团“搞垮了保甲组织”。先是要解散动委会，取消工作团。经我党通过上层活动，据理力争，始得幸免。后来又要将工作团和进步青年编入地方政权系统，企图搞垮我们的力量，使得我们难以正面反抗。于是我们党利用各种关系将工作团的骨干分子和进步青年分别转移和分散。我虽然离开了工作团，但由于在麻埠的行动，打击了桂系的嫡系部队，势必遭到反动派的报复，所以同时转移了。经张劲夫同志安排，我便辞去麻埠区长职务，到了省财政厅。先在财会人员训练班当指导员，不久，便以国民党“财政厅视察员”的公开身份去皖中地区活动，整理和视察地方财政，先后在为、和县、含山、巢县、古河

一带开展工作。这期间我和金家寨与当地党组织及新四军江北纵队都保持着秘密联系，来往于皖东和金家寨之间。组织上告诉我：在我党和桂系没有公开发生冲突以前，一定要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做这一地区国民党专员、县长、地方绅士等上层人士的工作，配合我党我军的活动，情况紧急时就回到新四军去。我根据党的指示，广泛进行上层交朋友的活动，宣传我党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在新四军的配合下，协助地方发展抗日力量。这种在上层交朋友的工作，活动了很多进步人士和开明绅士，为后来开辟抗日根据地起了一些作用。

一九三九年冬，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桂系势力开始在金家寨清查迫害进步人士。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纷纷向皖东、淮北新四军占领地区转移。党组织告诉我，国民党通缉的三十多人名单上有我的名字，要我不要再回金家寨了。我由无为撤到定远县藕塘。一九四〇年初，在藕塘的瓦屋薛村听了刘少奇同志关于建立华中抗日民主政权的报告。此后，我根据路西区党委的要求，通过和县国民党县长的关系，摇身一变而为国民党和县白渡桥区的区长，继续做上层统战工作和建立敌后政权，开始了新的战斗征程。

（倪方六记录整理于一九八一年冬）